

移民：香港经济繁荣的创立者

郑桂珍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个部分。总面积为1075平方公里。1990年底，全港人口达5859600人，是世界上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430人。香港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别颇大，港岛、九龙、新九龙和荃湾各市区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300人，新界（荃湾除外）则为1920人。

昔日香港，本是一个古老残旧的渔村，地瘠山多，水源缺乏，是一个除了阳光、海水、石头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的贫瘠地区，唯一的天然资产就是优良的海港。经过百余年的辛酸坎坷，香港逐步发展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它经济繁荣，信息灵通，科研设施先进，国民生产水平高。199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以当时的市价计算为12069美元，以1980年的固定市价计算为5732美元，高于世界当年的平均水平。香港现已成为亚太地区“四条小龙”之一，其发展速度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罕见的。其中的原因何在？引起世人的注目，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笔者于1991年4月赴港访问、交流，对有关问题也做了些考察，以下仅从人口学角度略抒粗浅之见。

新老移民之贡献

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的因素很多，撇开自然条件、历史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不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500多万勤劳、纯朴的香港人。也就是说，自开埠以来，陆续迁进香港的移民，是香港的最大资源之一，新、老移民是香港经济繁荣的创立者。

香港原来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渔村，1841年，英国刚占领香港时，香港人口只有5500人，其中主要是渔民和农民。由于港英当局采用人口自由流动政策，随着商业的发展及战乱等原因，大量内地华人流经香港。以后还由于内地的天灾和人祸，人口大量南移。香港移民的迁入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1—1865年。时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大量内地人口南移，其中人口增加最多的年代是太平军逼近广州期间，附近许多富户迁港暂避，到1854年，即英国占领香港14年之后，香港人口已达55715人，其中华人54072人，外籍人1643人。至1865年，又猛增到125000人，形成了第一次移民高潮。

第二阶段，1865—1921年，为第二次移民高潮时期。1900年，由于大瘟疫，使得香港移民减少，而且大量居民返回内地，人口大减。到辛亥革命时期，又有大量内地人口流进香港。从1901—1921年，二十年间，人口翻了一番，跃为62.5万人（其中华人61.5万，外籍人9941人）。

第三阶段，1922—1939年，人口再次大增。此时，香港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时期，经济的增长，使人口吸引力增强。1921年，香港人口已突破80万大关；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1938年攻占广州，华南大批居赴港避难，移民大增，1937年已超过100万，1939年，又增至160万。

第四阶段，1941—1953年，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香港经济濒临崩溃，成了死港，许多人纷纷返回内地，同时，日军为减少人口压力，将大量人口驱逐出境，遂使香港人口大减，至

1945年日本投降时，香港人口仅剩60万人，日本投降后，许多人又纷纷回港再谋生计，到1946年底，香港又很快恢复到战前160万人口的水平。1947—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为逃避战火，内地居民大量赴港，一些国民党达官贵人、地主乡绅、工商者也纷纷逃港。

第五阶段，1958—1962年，由于内地“左倾路线”抬头、政策失误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等，内地居民又再次大量赴港，同时南洋排华事件发生，也引起一部分华侨赴港。

第六阶段，1973年到现在。自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香港放松了出入境限制，以往从国外及香港回内地的居民纷纷申请赴港，邻近香港的内地居民，也先后大量赴港，其中一部分属偷渡入港。改革开放后，批准入港者又增多，这时期人口再次大增，1981年突破500万大关。1980年后，港府采取措施，入港者数量渐趋稳定。几年来，随着原境内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至1990年底香港总人口维持在近600万的规模。其中，97%以上是中国人，3%是外籍人。

显然，移民是香港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前与战后，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等国的居民不断到香港定居，与原居民胼手胝足，辛勤劳动，为香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大量移民入境，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增加，并因此而促使香港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变。移民入境，适应香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不足的需求，为资本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香港从开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港谋生的内地居民，多数是年轻、身强力壮的单身男性，其妻子、子女留在国内，因而人口性别比高。战后，尤其是70年代的新移民中，不少也是单身男性。在非法入境者中，男性也大大多于女性，所以，在1981年新移民高潮时，也是性别指数最高的年份，大量男性劳动力涌入后，主要从事码头装卸、货物运输、船舶维修与补给，以及与转口贸易相关联的航运、建筑、商业、服务业等工作，大大促进了转口贸易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积累。

战后，香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了支撑香港经济的主体，当然，它们仍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务型的资源结构并没改变，移民仍是发展香港经济的主要动力。

香港经济发展，也与大批专业人员的作用分不开。70—80年代，内地赴港移民中的大部分是40—50年代回国的东南亚侨生及港澳青年，他们到内地求学，求职，然后回港谋生、求职。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内地受过高等教育或是长期从事专业工作，知识水平高，业务能力强。这批人的回港大大充实了专业人员的队伍，反过来却为港英当局节省了大量的抚养费和教育费。

重要的是，新老移民是以经济活动人口为主体，皆是青壮劳动力，他们进取心强，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在品质上又继承了中华民族勤劳、俭朴的优秀传统，而在新环境里，他们又接受了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先进科技与知识，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能够锲而不舍地奋斗，一往无前地拼搏。正由于移民一般都具有相当文化水平，而且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年轻的男性劳动者为多数，因而，他们的迁入，在为香港节省了一大笔培训费用、有利于当局将有限的资金转用在装备劳动者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上的同时，更大大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香港就是这样依靠内地新、老移民及部分外籍专业人员的这一高度密集，并具有稳定性、专业性的劳动力资源，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高竞争能力和高经济效益。有关材料表明，一个电子产品，从设计到投入市场，美国要8个月，日本要5个月，台湾要4个月，而香港只要3个月。

人口素质提高之效益

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素质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和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本上是以简单的手工工具和手工劳动为主，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高，甚至文盲也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生产高度自动化，加上原子能和电子技术的广泛使用，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能不使工人受到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在人口中普及教育的作用。香港的早期教育，带有深厚的殖民地气息，战后，特别是60—70年代香港的经济的发展，对教育制度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教育面向社会的思想日渐抬头，为经济发展培养专业人才的措施也逐渐建立。70年代中期起，随着严格控制移民数量措施的执行，加强了对劳工的职业培训，香港人力资源的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香港九年制免费强迫性的义务教育，是造就新一代高素质劳工和专业人才的保证，近几年免费中学教育中兴起的职业选修学校及普通学校中开设的商科技能课程，更直接为学生未来的就业服务，各级各类大学则培养起了一批批高级专业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经济发展的栋梁。引人注目的是，70年代量大、人多、面广的香港职业教育，对广泛提高在职劳工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有志劳工获取高学历、进入专业人士行列创造了条件。香港还严格实行薪酬与学历（含受培训程度）挂钩的制度，劳工为获取更高的收入，必然发奋学习和刻苦进取，当然也促进了劳工素质的不断提高。劳工素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相应也会大大提高，当然也就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如今香港居民择业欲望强烈，他们一般不满足于“有工作”、“有稳定的收入”，而追求更能施展才华、开拓事业的机会。在新观念的驱使下，他们勤奋学习、执着追求，不少劳工纷纷“跳槽”，其中一些经职业培训获得新的职业技能，或者获得专业资格、获得文凭或证书的，就有条件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另求出路，以求在新的工作岗位再展身手。可以说，职工的不断流动，也不断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香港人，尤其后期赴港的移民，都有一服拚劲，他们艰苦奋斗，尽快适应环境，分秒必争地工作、创业。如今，香港居民中，有200多万是战后出生的，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更多教育，获得了高级学位，尤其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一代，能把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传统结合起来，他们成了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的香港人，具有很强的时间观念、投资观念、市场观念和法律观念。他们惜时如金、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在路边、道旁，经常可闻“传呼机”的鸣叫，可见到“大哥大”在进行繁忙的业务联系。在香港，一般人都将余下的钱进行各种“投资”，目的非常明确：赚钱。投资—赚钱—再投资—再赚钱，循环往复，而正是如此大大小小的投资活动、商业活动，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香港人，尤其香港企业家具有一种非常实用但与众不同的市场观念：大大小小的企业、商店均是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他们眼里，最受市场欢迎的产品，能赢得最大利润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他们并不希望去开拓市场，领导潮流，这样，既可赚钱，又可少担风险；为了更安全地赚钱，香港人还具有很强的法律观念。在香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一直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企业自生自灭，优胜劣汰，大小公司多如牛毛，“商场如战场”，竞争极其激烈。要使经济活动正常、健康地进行，必须要有严格的竞争规则来保障，必须要有正常的管理来约束，这一切全部仰仗法律来实现。香港人似乎都知道应该按法律允许的范围行事，法制观念是极强的。

流入人口的积极影响

流入人口指的是香港的非定居人口。由于务工经商、旅游、家事、会议、健康等原因赴

港而且逗留时间超过24小时以上的外埠居民，香港当局将之定义为游客。70年代后，旅游业蓬勃发展，成了群众性的生活方式，香港则在此大好形势下，发展为一个世界知名的旅游中心。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气候适中，且充满东方文化色彩，故香港对旅客有较大的吸引力，加上当局简化出入境手续，并实行低税制，香港成了购物天堂；香港还适时开拓旅游资源，建立各种基础设施，使旅客感到在港一切十分方便和安全。香港有着亚洲一流水准的现代化设施，集中了许多五星级酒店、大型购物中心以及品种繁多的商店，以满足各类旅客的物质和服务享受。

现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非常蓬勃，1986年，游客总数达3788495人，其中北美游客832164人，西欧游客573425人，日本游客727219人，东南亚游客735609人（见表1）。

表 1 1978—1986年到港游客人数（人）

年 份	游 客 总 数	其 中				
		美 加	西 欧	日 本	东 南 亚	澳 新
1978	2054739	284624	318005	487250	540441	172990
1982	2609100	439270	389113	515697	594699	239290
1983	2775014	525238	402890	502175	642553	250712
1984	3151677	656941	436552	584013	664780	304615
1985	3443173	751713	500959	635767	706180	298713
1986	3788495	832164	573425	727219	735609	304019

资料来源：香港旅游协会

1988年抵港的旅客数则达30078千人，1989年稍有下降，1990年则达31835千人（见表2）。

表 2 1988—1990年抵、离港旅客数（千人）

年 份	抵 港	离 港	年 份	抵 港	离 港
1988	30078	30106	1990	31835	31832
1989	29122	29114			

资料来源：入境事务处。以上数字不包括（1）过境旅客；（2）不准进入香港的旅客；（3）进出香港的军人。

从抵港游客的构成看，高级职员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教授、专家、工程师、教师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妇女，占据较高比例，她们多数抵港探亲、访友及旅游。总之，高身份的旅客约占2/3左右，因而带来高消费、高需求，也就进一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那里经济的繁荣。

香港旅游每年所创造的价值，是以外汇形式获得的，它占香港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在6%左右，这对香港外汇的创造及对外资赤字的弥补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同时这也促进了市政建设，扩充了酒店、宾馆、娱乐等行业的就业门路。大量的流入人口，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他们返回故土后又成为香港的义务宣传员，对香港在海外的影响力以及香港产品的竞争力都有莫大的好处。近几年，香港外籍家庭佣工也大量增加，1990年，外籍佣工共有70335名，较1989年的57971名，增加21.3%，其中多为菲律宾女性，约占佣工总数的90.5%，她们

（下转第63页）

去，这样的“高度城市化”显然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必然联系。

以色列的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三大城市区，是其城市化的另一个特点。目前，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海法三大城市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6.8%，占全国城市人口总数的63.2%。这种现象也同时说明了以色列人口高度集中的程度。

与犹太人口的高度城市化相比，阿拉伯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较低，他们多数生活在传统的农业区，很少有从农村向城市的移迁。阿拉伯人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口迅速自然增长，使得原来的农村聚居地人口超过2000人，便被划为“城市”的结果。

七、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高

经济的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人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后天教育取得的，教育赋予劳动力人口以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劳动者受教育的年数或等级可以作为劳动力质量的一个指标。据此，以色列劳动力的文化教育水平一直居于世界最前列。1989年15岁以上人口中，受学校教育13年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犹太人口为27.6%，非犹太人口为8.4%。比重如此之高，首先是犹太民族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即使散居世界各地，也视教育为民族生存所系，从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便以受现代化教育和现代观念熏陶的欧洲青年为主。到1948年建国时，以色列人口中大学、中学毕业生的比重都居世界第一位。其次是以色列政府极为重视教育，建国以后国家颁布的第二道法令即是《义务教育法》，教育经费在政府预算中仅次于国防开支，全国5—16岁人口均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再次，以色列每年吸收大量移民，国际移民可以视为国际间人口投资的转移，移居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文化教育水平高，近年来以前苏联犹太人为主，移民中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术界人士的比重很高，这无疑对以色列经济发展会起到推动作用。

但是，以色列的人才浪费现象也是十分惊人的，由于大批苏犹的涌入，移民多数难以找到工作，如1990年抵以的移民失业率高达40%，1991年抵以者失业率更高达54%，其中9300名医生经重新考核，仅有三分之一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此外，还有约4万名工程师、1万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失业，造成了人才的巨大浪费。由于安置困难，失业严重，迫使大批前苏联犹太移民离开以色列到别的国家去谋求生路。据统计，1991年有10789名俄罗斯犹太移民申请离以护照，7964人获准离开，其中70%的移民从此一去不复返。“犹太家园”对犹太移民的吸引力减弱，导致了这种“再移民”现象的产生。

综上所述，无论在民族与种族构成、增长、迁移与分布等各方面，以色列人口均有其特殊性，而人口文化教育水平高，对于以色列劳动生产率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产品的开发，十分明显地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上接第54页）.....
的到来，为香港众多的职业女性摆脱家务重负，以便专心致力于工作和事业创造了条件。

总之，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给香港经济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它不仅加速了香港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促进了香港与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交流，同时，对香港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500多万的香港人和几千万的流动人口是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港人治港”的决策是正确的、英明的，它必将进一步推动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大人口研究所）